



浙东革命根据地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革命斗争史丛书

浙东革命根据地

(初 稿)

吕树本 杨福茂 金普森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革命斗争史丛书
浙东革命根据地(初稿)
吕树本 杨福茂·金普森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875 插页 2 字数 81,000
1980年1月第一版
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103·37
定 价：0.29 元

引　　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东广大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长期斗争。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浙东就有我党的活动。宣中华、杨之华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地区的农民运动，曾在六十多个村庄建立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为了响应和配合北伐战争，党组织发动了工人、农民和盐民的斗争，著名的有一九二五年四月的余姚一万余盐民的大罢工。当北伐军进抵浙江前夕，浙东各县大多有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二七年初，正式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浙东领导和发动了多次的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组织过地方红军——“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勇猛的反抗斗争。只是由于受到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虽然浙东的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暂时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和摧残，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撒遍浙东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苗芽。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浙东各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地区还组织了地方武装，以武装自卫和袭击敌人。皖南事变和浙赣战役后，根据形势的变化，遵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浙东的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开创了浙东革命根据地。

浙东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它包括四明山、会稽山、三北（当时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的杭州湾南岸地区）和浦东，共四个地区。它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南迄东阳、宁波公路一线，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东岸地区。这是个战略要地，为当时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到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以后，留在浙东的党组织，继续领导革命群众坚持斗争。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建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后，他们不仅恢复了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并且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使当时的浙东游击根据地发展到北濒杭州湾，东临大海，南沿奉化、新昌、嵊县、东阳公路，西迄富春江东岸，纵横面积达三万余平方公里。它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合为当时全国南方七个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之一。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浙东人民，在建立、巩固和扩大浙东革命根据地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谱写了一曲胜利的凯歌。

在浙东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烈士们的辉煌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

目 录

引 言	(1)
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前的形势	(1)
二、中共浙东区党委的成立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7)
三、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成立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33)
四、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和临时代表会议的召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成就	(48)
五、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61)
六、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和浙东人民的反“清剿”斗争	(71)
七、中共浙东临委的成立和浙东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恢复	(85)
八、中共浙东临委一月会议。浙东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98)
九、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省而斗争	(109)
后 记	

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 辟前的形势

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三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称十八集团军），由陕甘宁边区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十月间，长征后坚持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万二千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先后进入大江南北，抗击日军。长期在浙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五百多人，在粟裕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浙南根据地，开赴皖南泾县，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以后便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抗战，推行了一条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即反人民战争的路线。因此，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大溃退的局面，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便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

广州和武汉一直退到四川。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地处抗战前线的浙江的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一九三七年底，日军侵略浙西杭嘉湖地区后，浙江人民面临着抗日救亡的严重任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以刘英为代表的中共闽浙边省委，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党员”和开展白区工作的指示，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白区工作团，分赴浙南和浙西南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同时，上级党组织也从上海、延安和其他地区调来了大批党员干部部分赴浙东、浙西各地开展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浙江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全省各地蓬勃地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原来的中共闽浙边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四月改组为中共浙江省临时委员会，并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正式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员会，以刘英为书记。

这时，日军的侵略矛头直指浙江，浙东、浙南的苟安局面朝夕难保。广大人民特别是从沦陷区撤退来的爱国青年与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从事抗日宣传和战时服务，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国民党桂系黄绍竑为省主席的浙江统治当局，有鉴于此，决定设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组织，以便于统一规范，为其所用。从一九三八年初起到同年九月间，全省七十五个县，不论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普遍成立了政工队。共产党派遣党员到政工队中去工作，贯彻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当时有很多县的政工队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

或影响下开展工作的。他们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减租减息等政策，发动广大农民，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政工队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抗日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有力工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引诱下，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国民党英美派蒋介石集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

随着全国形势的逆转，浙江的政治形势也起了显著的变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宣传，加强控制民运，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到一九四〇年夏，他们将各区、县的政工队划归三青团管辖，施以所谓“训练”后，改组为“战时青年服务队”，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在这时局逆转的形势下，共产党在浙江的各级组织，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撤退公开的党组织和面目较红的党员，转入地下工作，因而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有生力量，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日寇为了巩固其对京沪杭中心地区的占领，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进一步的侵略。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日寇趁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大肆反共之际，发起了宁绍战役，大举入侵浙东地区。三月，日寇侵占萧、绍等地。四月，另一路日寇由镇海要塞登陆，连陷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县。当时，驻守在宁绍一线的国民党正规军和杂色部队不下十万人，但是在国民党的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使下，他们在日寇入侵面前一触即溃，望风逃窜；不到一个多月时间，浙东北部纵横四百余里的富庶平原，全部落入敌手。

日寇侵入浙东后，到处进行残酷的掠夺、烧杀和奸淫。悲惨之声遍彻原野，凄凉之景不忍目睹。仅以余姚为例：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余姚沦陷后，在后青门外火车站旁的树林下及小玉皇山两地，被日寇杀害的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达三百多人，在龙山下罗家大厅被日寇用警犬咬死的有一百多人。

在国民党政权瓦解，日寇势力无法深入的广大农村，一时成为空隙地带，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无法无天，趁火打劫，扰乱民生。逃窜到姚南、慈南地带的余姚和慈溪的国民党县政府，不但压制人民起来抗日，而且极力收编土匪部队，给以“合法”名义，借以霸占一方，鱼肉人民，压榨百姓，使浙东敌后人民处于痛苦不堪、灾难深重的境地。

当时四明山区流传着一首民歌，歌词是这样的：

春来杜鹃满山中，

须伪勾结乱浙东。

四明风景多明媚，

如今烽火照眼红！

多少民房化灰烬，

千里大山断鸡声；

户户箱笼抢干净，

大街小巷无人行；

耕牛山羊被宰光，

老少妇女遭奸淫；

天黑不敢点亮篾，
夜半怕闻狗吠声。
劝君莫说黄连苦，
顽伪煎迫苦万分。

但是，具有革命传统的浙东人民，在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烧杀淫掠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压榨欺凌面前，绝不屈服，英勇顽强，同仇敌忾，誓死抵抗，不断掀起抗日救亡的巨浪。

这时，共产党在浙东的各级组织，在日寇强大的压力下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反共之中，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击日寇的侵略，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绍兴、诸暨、余姚、慈溪、新昌、嵊县、鄞县、定海等县的共产党组织，为建立武装曾作了努力。如绍兴有袁啸吟等人组织的游击队；慈溪有戚铭渠、柳剑青等人组织的游击队；镇海横河有王博平组织的乡自卫队。党还利用统战关系，开展抗日自卫斗争，先后派遣干部打入国民党军队和杂色地方部队，进行兵运工作。中共余姚中心县委在余姚沦陷后，曾派县委委员赵树屏（化名王益生）到国民党三十四师残部孙彦龙连去联络，组织了敌后抗日的“宁绍游击队”，由原连长孙彦龙任大队长，王益生任大队指导员，并陆续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进去，还组织了一个随军服务队。该部迅速发展到三百余人，编为三个中队，拥有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掷弹筒三个。但是，由于当时余姚的共产党组织还缺乏搞武装斗争和改造旧军队的经验，没有大力改造这支旧军队，这支部队里没有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官孙彦龙等，不久受日寇的诱降，于六月二十五日（有的说为七月二十五日）阴谋杀害了王益生，次日即以“挺进周巷，出发打鬼子”为

名，拉走部队，投敌为逆了。

总之，这个时期，共产党在浙江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的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全省共产党员已有二万余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在各地组织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救亡工作组、后援会、服务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促进了抗日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皖南事变前浙江党的组织在中共中央东南局的领导下，也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浙西杭嘉湖地区的一些城镇虽然已被日寇占领，但是敌后的广大农村还未被控制的时候，没有按照党中央总的战略部署，及时组织力量插到浙西敌后去，即在京沪杭三角水网地带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积蓄和壮大人民的力量，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却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及其正规军身上。同样，在开始搞武装工作时，不重视武装工农群众，只是把眼睛看着国民党的军队，对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只着眼于争取他们，而忽视改造他们。因此，这个时期的兵运工作，除个别地区外，都象余姚一样，先后遭到失败。

二、中共浙东区党委的成立 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建立

(一) 浦东武装南进。相公殿首战大捷。三北 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号召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二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示华中局加强对浙东、闽浙赣边地方党委的领导，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这些地区发展，创立游击根据地。浙江的党组织在余姚、慈溪、镇海、会稽山等地区，发动武装抗日后，中共中央根据浙闽沿海的新形势，又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准备成立一个战略单位。华中局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浙东、浙西两地党的工作，暂时划归中共苏南区党委领导。苏南区党委随即

指示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南汇县为中心的黄浦江东边一带，一九四一年二月前属上海的党组织领导，以后归苏南区党委路南特委领导），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夏间，中共浦东工委即在国民党南汇县抗日自卫团中掌握了第二中队和第四中队两支抗日武装，在南汇东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发动“扫荡”，第二中队在泥城与日寇血战，中队长、共产党员周大庚等三四十人壮烈牺牲。不久，该中队又因“色彩”暴露，被国民党南汇县长缴枪解散。第四中队的中队长为南汇县第二区区长连柏生兼任，由于他的关系，该中队很快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到一九四〇年冬，该大队又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沪办事处专员平祖仁取得联系，改名“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仍由连柏生任支队长，下辖两个大队，即褚亚民的第一大队与林达（即林友章）、蔡正谊（即蔡群帆）的第四大队。与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派党员干部吴建功、姜文光等打入伪军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去当二营营附（即副营长）。“附”是“副”的意思，下同）和三营教官。由于该团储贵彬等三个营长又都是靠拢共产党的，于是通过统战关系，又陆续派入一批共产党员去当连排长。这样，中共浦东工委就很快掌握了该团的大部分武装。这个团的活动地区为南汇县的大部分和奉贤县的一小部分。上述这两支武装都是中共浦东工委领导和掌握的。他们表面上打着国民党军队或伪军的旗号，实际上执行共产党的荫蔽埋伏、积蓄力量、伺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灰色荫蔽”的方针；在斗争中又能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因此能在浦东地区站住脚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四一年春，日伪为了强化伪政权，在沦陷区实行“清乡”整编，伪军十三师将要调防去浙西。五月间，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中共苏南区党委的指示，在中共路南特委书记张瑞昌（即顾德欢）的指导下，研究决定：将我党掌握的荫蔽在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中的那部分武装力量，除戚大钧等少数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精悍党支部继续留在伪五十团外。其余党所掌握的各部都拉出来，分批南渡杭州湾，向浙东“三北”地区（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发展。

首先，中共浦东工委派姜文光、朱人侠、姚镜仁、陆扬等分率所部武装共约两个连的兵力陆续南渡到三北地区。通过统战关系，分别与在余姚游源一带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沪办事处在浙东的后方机关“宗德公署”（也有人说“崇德公署”的，主任为薛天白）和忠义救国军孙云达部建立关系，取得“宗德公署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与孙部“海上游击司令部第一大队”（简称“海上一大”）的番号，借他们的名义进行荫蔽活动，发展武装。姜文光和姚镜仁、陆扬的部队编为宗德三大，姜文光任大队长。朱人侠的部队编为海上一大，朱人侠任大队长。这两支部队分别在浒山、横河和新浦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当姜文光和朱人侠等人带领首批部队南渡后，日寇又发动向浦东抗日游击区“扫荡”，林达、蔡正谊领导的五支四大百余人（也有的说为六十余人），被压缩到浦东海边。该部得知姜、朱部队已首批南渡到浙东后，也就于六月（有的说为七月）十三日南渡杭州湾至段头湾登陆，又与宗德公署薛天白部建立关系，扩编为“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淞沪三支”），林达任支队长，蔡正谊任教官。淞沪三

支队即在慈北、镇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八、九月间，中共路南特委派军事部长吕炳奎到三北来，建立中共淞沪三支工作委员会，以吕炳奎为工委书记。

当淞沪三支到三北相公殿（庵东东面）宿营的次日，即六月（有的说为七月）十八日清晨，驻庵东的日军四五十人，耀武扬威地到相公殿“扫荡”。为了狠狠打击日寇，鼓舞人民的斗志，淞沪三支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进到相公殿西的许家村，在日寇的归途上设下了埋伏，待日寇进入伏击圈后，发起突然进攻，结果：毙伤日寇二十多名，淞沪三支无一伤亡。相公殿首战大捷。这是浙东人民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也是三北人民第一次看到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队。战斗结束，附近群众担茶送水，送点心，热情慰劳抗日军队。同一天，许家村十多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抗日游击队。

十月五日（中秋节），中共浦东工委再派朱人俊、洪尚洁（即方晓）等率领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中由共产党掌握的二营六连、三营八连和九连三个连和守望队一个连三百多人，第三批南渡到达三北相公殿。这支部队通过另一统战关系，编为“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姚北人民爱称“老三纵”），纵队司令为朱人俊。暂三纵不久成立了中共三纵工作委员会，由王耀中、朱人俊和洪尚洁三人组成，以王耀中为书记。中共三纵工委在党的组织关系上，统一领导宗德三大与海上一大。这样，归暂三纵统一指挥与隶属的共有六个大队，即洪尚洁的特务大队，朱人俊的第一大队，黄明的第二大队，姜文光的第三大队，姚镜仁的第四大队，蔡葵的第五大队。暂三纵在东起新浦沿，

中经长河市、第泗门、临山，西迄上虞北乡灵惠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三批南渡到三北，深入群众，宣传抗日，开展游击战争，给浙东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相公殿战斗胜利后，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又在施公山、长溪岭等战斗中连歼日寇。十月十日，暂三纵在追击土匪陈阿二部，宿营登州街附近时，与从周巷据点出扰的日军遭遇，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被击退逃回周巷。这是暂三纵到三北后初战日寇，并取得了胜利。十月二十一日，宗德三大（即暂三纵的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拟在横河附近孙家井一带袭击日寇。待至次日天明，未见敌踪，乃向横河镇进发，打算去该镇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由于麻痹，白天行军，遭到日军伏击。抗日健儿血战一个半小时，姜文光、姚镜仁、徐吉等四十二人壮烈殉国。横河血战申张了民族正气，表现了抗日战士誓死杀敌的伟大气概。横河战斗后，余部一百多人由陆扬负责，随暂三纵总部行动。

十一月间，暂三纵总部率特务大队和二、三、五大队在余姚、上虞边界活动时，与日寇在梅园丘发生遭遇战。日寇在遭到猛烈攻击后，仓皇遁回五夫据点。暂三纵第三大队指导员陆扬和陈大队附在激战中牺牲。

日寇发现在三北地区有很多抗日游击队后，即调集一千多兵力，向三北敌后进行大“扫荡”。淞沪三支和暂三纵早有准备，各部队分散活动，因此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为了加强党对三北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以便更有效地